

中國

當代小說
名著
1分鐘

李復威、楊湮 主編

學苑出版社



李复威 杨 涇 主编

学苑出版社

执行编委：陈辉 郭强 田靖

责任发行：朱迎

责任印制：张翔

中国当代小说名著一分钟

李复威 杨涇 主编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17 字数：460千字

印数：00001—7000册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077-0327-4/G·260 定价：7.10元

序

——中国当代小说的总体风貌及发展轨迹

李复威 杨 涔

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往往同时也是新的文学发展阶段的开始。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国这块浸润着中华民族的血泪、智慧、憧憬的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代诗人在忧愤中所向往的“世外桃源”，现代作家在搏击中所追求的“太平盛世”，终于不再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影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伟大的历史性的巨变召唤着崭新的文学的诞生。我国当代文学就是在尚未停息的大炮声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的交织中揭开了扉页。

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百花园中，小说是面积最大、收获最丰的园圃。小说是通过语言艺术的运用，塑造形形色色的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传达时代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具有广阔的画面感、综合的叙事规模、描绘的具体细腻、阅读的广泛的适应性等特点。由于它在描摹时代风云、揭示现实矛盾、表现社会心理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所以小说创作发展繁荣的情况，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历史时期文学成就大小的重要标志。

我国是一个有着源远流长的小说创作传统的国家。从古代小说雏形阶段的先秦寓言、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到小说

成熟时期的宋元话本、明清及近代小说，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五四运动以后，由于语言形式的变革和对外国文学的借鉴，随着无产阶级文学和进步文学的发展，现代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鲁迅、茅盾、沈从文、叶圣陶、老舍、巴金、赵树理等作家的努力下，小说不仅深化和丰富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实现了从体裁形式上由传统的故事体向现代的小说体的美学转化。我国当代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民族土壤中萌发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作家们有了创作的适宜环境和良好条件。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向与作家创作的总体目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和一致，激发起作家高度的创作热情。在党和人民的关怀鼓舞下，作家们以积极的进取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兴旺起来的解放区文学给当代文学带来了直接的经验 and 营养。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层出不穷的新人物和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当代小说也是在这样良好的条件和氛围中起步的。

1949年7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党向一切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使命：“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的人民革命时代的有思想的美的作品”（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这样，当代小说创作在建国初期也就面临着历史性的巨大转折和崭新开拓。从小说的社会功能、描写对象、情感基调到作家的思想体系、知识结构、艺术风格都开始发生符合时代需要的变化。

建国之初，虽然长年战争造成的国民经济的衰蔽情状非

常严重，虽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仍十分低下，但是，国家的解放、民族的新生、人民的当家做主，使千千万万挣脱了枷锁的奴隶欣喜若狂。历史翻开崭新的篇章：往昔的改朝换代都是一些剥削阶级代替了另一些剥削阶级，而如今新中国的诞生却是破天荒地被迫、被奴役的劳动大众伸直了腰板，第一次真正以“人”的姿态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强烈的、难以抑制的翻身感、幸福感、扬眉吐气感就集中在小说创作中表露出来。

新的生活风貌的展示一开始较集中于家庭、婚姻、爱情题材方面的创作之中。家庭、婚姻、爱情，尤其是妇女解放的问题，往往成为一个时代文学发轫的敏感点。新中国小说也是首先以此作为聚光镜，映射出新旧时代转折的普遍性的社会特征的。谷峪的《新事新办》、《强扭的瓜不甜》，马烽的《结婚》、《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品。抗美援朝是建国初期我国的一次重大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行动。不少作家奔赴朝鲜前线，怀着难以抑制的激情，迅速以小说的形式写下了一篇篇感人肺腑的作品。巴金、路翎、刘白羽、和谷岩等作家都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它如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创作也取得初步成果。总之，随着新旧社会的变迁，随着各种文学体裁的总体发展，建国初期的文苑已清晰地显示出现代小说向当代小说转折的历史轨迹——从内容到形式、从情调到色彩，新的小说过渡性地草创的历史轨迹。从小说的主题指向和题材内容来说，从过去的重在暴露、批判、抨击转变为重在肯定、赞扬、歌颂。这种变化是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文学最初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从描写对象和人物塑造来说，由过去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破产农民、为生计而日夜奔波不息

的小市民以及为寻求出路而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侧重表现具有新的思想、新的精神风貌，具有当家作主气魄的、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这是一些中国过去的文艺中从未有过的崭新人物。它开创了中国革命小说的一个新阶段。从小说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从过去的抑郁、悲戚、怨诉、愤懑转变为清新、明快、开朗、欣悦。这是时代精神在建国之初的小说中所涂抹上的总的底色。

必须看到，建国之初的小说创作，从整体来说尚处于比较幼稚和落后的状态。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状态——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新颖与创作质量、艺术水准低弱的矛盾。首先，从作家主观上考察，许多作家对解放后迅猛变化的新生活，热情欢呼有余而深入了解不够。对描写新社会、新人物缺少思想感情和艺术功力上的准备。国统区内原来一些艺术造诣较高的作家，由于手中新素材的拮据创作上基本处于低潮期。而解放区内活跃的许多作家，虽然创作思想和方法上有着连续性和延伸性，但因为动荡年代的影响而在美学修养方面犹嫌不足。其次，当时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方面也出现偏颇，强调“写中心”、“赶任务”，对文学的功能和作用做了简单化的理解。这样，使得一些作品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而图解政策，人物形象缺乏生活实感，情节发展具有主观随意性，复杂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深刻的揭示。另外，在建国之初，在小说领域已经出现了错误批判作品的苗头。如当时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就是不公正的。路翎的这篇小说，以非凡的艺术魄力描写一个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中朝儿女之间的动人的爱情故事。主题是正确的，人物是可信的，感情是健康的。只是由于触犯了当时教条主义的文艺思想所设置的“战

争题材创作不能写爱情”的禁区，就被指责为是“对革命纪律有血有肉的控诉”。肖也牧的小说则是通过一对青年夫妻的生活矛盾和爱情纠葛，探讨了解放初期广大干部从农村转入城市工作后，如何永葆革命本色的重大课题。作品重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人物充满生活的气息，应该说是一篇好的小说。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丑化了工农干部”，是“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这样的批判虽然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整个文坛的支配性倾向，却预示着初生的当代文学前程多艰。

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强调指出了建国初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的危害性。这对后来小说的发展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小说创作从过渡性的转折阶段跨入到初步繁荣的时期，其中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的创作取得较突出的成绩。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革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斗争，有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全民族同仇敌忾的八年抗战，有千军万马显奇功的解放战争……在当代小说作家中有不少同志是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他们十分熟悉斗争的情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有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促使他们将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记录下来，传播开去。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在建国后十七年中始终没有间断过，其创作成果之大，艺术水平之高，涉及的作家面之广，在当代各种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是名列前茅的。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就是这类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小说以宏伟的规模和高度的历史真实性生动地再现了1947年延安保卫战的全过程，成功地绘制了雄伟壮观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巨幅画卷。孙犁的《风云初记》，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徐光耀的《平原烈火》

火》，柳青的《铜墙铁壁》等，都是本时期优秀的长篇小说。峻青的小说集《黎明的河边》，大多描写山东老革命根据地艰苦的敌我搏杀的斗争生活。他那悲壮的风格在当代文坛上是十分鲜明突出的。王愿坚的处女作《党费》获得较大的成功。他注重表现革命斗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由诗情、画意、哲理的有机融合而形成一种深远的意境。茹志鹃的《百合花》堪称名著。她的清新、俊逸的艺术个性始终渗透在硝烟滚滚的战场描写之中。农村生活题材小说创作的兴旺也不是偶然的。我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农村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五四”以来，从鲁迅的创作开始，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一个有不少宝贵经验可资借鉴的传统。许多当代作家出生、生活、工作在农村，他们与农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他们自觉地担负起反映农村生活变革的历史职责。另外，解放后所带来的农村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社会心理、精神风貌和人与人关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小说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赵树理的《三里湾》是一部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驱之作。其它象秦兆阳、马烽、李準、康濯、欧阳山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也取得显著的成绩。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是当代小说取得重要突破的关键时期。当时，党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紧接着又发出了开展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为目标的整风运动的号召。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开展，活跃了思想解放的空气。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著名的繁荣文化、发展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小说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许多

作家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注意克服创作脱离现实、粉饰生活的不良倾向，敢于揭示社会中的复杂矛盾和阴暗面，更加符合艺术规律地去探讨新的创作领域和方法。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这些小说比较集中于两个方面的内容：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描写绚丽多彩的爱情生活。前一类创作是“干预生活”作品的核心部分。它们都接触到现实中的落后面和阴暗面，塑造了处在一定领导地位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也嘲讽了那些助长官僚主义习气的投机取巧、吹牛拍马的人，还刻画了对这些不正之风进行抵制和斗争的正面形象。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发人深省的主题思想、内蕴深邃的人物形象和震聋发聩的社会效果，成为了“干预生活”潮流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其它还有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南丁的《科长》，耿龙祥的《入党》，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李国文的《改选》等。另一类作品是以爱情生活为题材的。建国后的小说创作还是不乏爱情描写的，然而作品中有的爱情表现完全是小说内容的附属品。有的爱情色彩完全是政治化的，看不到爱情本身所特有的绚丽色彩。有的爱情内容套用一种现成的公式，没有正视爱情关系中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微妙性。这个阶段的爱情小说，对这些条条框框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使得爱情题材的创作开始以独立的姿态和成熟的模样出现于当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李威仑的《爱情》，是其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代表作。引人注目的生活课题，真实可信的故事情节，微妙曲折的爱情波澜，的深刻开掘的内心世界，都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可惜，这个文学潮流

很快就中途夭折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得一批有胆识、有才华、勇于探索的作家受到极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不少小说被无辜地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在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象这样揭示矛盾、切中时弊的作品就见得很少了。这是当代文学史上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

自此以后，小说创作在不断地排除“左”的干扰中前进。从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当代长篇小说得到引人瞩目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繁荣兴旺的丰收期。由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周期长，作家们建国后开始酝酿动手的作品，到这个时候才纷纷开花结果。又由于这些长篇大多是革命历史题材，受后来“左”的干扰较小，所以能形成一个硕果累累、美不胜收的景象。当代的不少传世不衰的著名长篇小说大多出自这几年当中。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德英的《苦菜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艾芜的《百炼成钢》，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上部），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这些长篇创作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题材有所扩展，反映生活的深广度比以往都大有提高。《红旗谱》、《创业史》是两部表现中国农民不同时代革命业绩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规模巨大，气魄宏伟。《青春之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建国以来小说创作在反映知识分子革命历程方面的欠缺。《上海的早晨》则开拓了表现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的创作新领域。《红岩》是一部前所未有的讴歌共产主义精神情操、感天动地的作品。《李自成》的诞生填补了我国长时期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其次，作品以开拓的精神刻画了多种多样的、富有鲜明个性和艺术风采的典型形象。有的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有的成了某种共同性格的别称或代号。这个形象画廊中，有革命斗争史上的英雄，有社会主义新人，有普通人，也有形形色色的反面人物。另外，一大批作家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长篇小说的形式、艺术表现力和民族化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展。总之，三十多年来，这批优秀作品都是多次再版，一直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并被广泛地翻译到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篇小说的这次丰收期，代表了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与此同时，短篇小说也在排除干扰中前进。建国初期已经有所发展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在这个阶段有了新的提高。不少在这方面造诣较深的作家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峻青、王愿坚、茹志鹃的作品，都继续显示出比较深厚的生活基础和艺术功力。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创作也继续得到发展。李準的创作更臻成熟，写出了《李双双小传》、《耕耘记》等优秀小说。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禾场上》等，写得自然、朴素、不事雕琢而独具意趣。马烽的小说视野更加开阔，内容更加深化，以《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创作硕果呈献给读者。值得提及的是，农村题材小说在这个阶段处于比较复杂的情态。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村经济政策出现严重的偏颇。过早、过频地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浮夸风”、“共产风”、“吃大锅饭”等不得人心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小

说对这方面问题的反映是十分不够的。甚至于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群众的饥饿状态，少数蜕化变质干部作风的败坏，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凋蔽……都未能在小说中得到应有的表现。一些粉饰生活，掩盖矛盾，违背真实之作，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

当然，文学对历史的曲折不会总是保持沉默的。在这个阶段难能可贵地出现了一小批对现实偏颇带批判色彩的小说。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欧阳山的《乡下奇人》，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西戎的《灯芯绒》等，都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反潮流的无畏态度，得到人民群众的赞许。另外，在六十年代初的一两年时间里，集中出现了四五十篇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大多是借古喻今，希冀从中国历史的演变里，总结出今人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这批作品是在作家不可能直言不讳地批判现实的特定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迂回”的办法。作家们敢于触及时弊的创作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成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文学领域中错误的批判运动接踵而至，文学创作的规律受到严重破坏，小说创作出现每况愈下的趋势。虽然也曾有浩然的《艳阳天》，陈登科的《风雷》，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等较有社会影响的作品问世，但也是良莠并存，优劣兼具。整个小说的创作势头已远远不如前个时期了。

纵观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回顾这一段艰难坎坷的历程，我们不能不承认：十七年小说创作的成绩是不应随意抹

煞的，而教训也是严重的，是必须牢牢记取的。

十年动乱时期是当代小说创作萧条、滞退的时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整个文坛是一派百花凋零的衰败残破的景象。小说创作自然是在劫难逃。许多作品在当时流行的“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三突出”原则等错误观点影响下，都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和缺陷：写作从概念出发，构织虚假的故事，人物缺乏个性，有的甚至为极“左”路线涂脂抹粉。在林彪、“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更产生了一批“帮派文学”、“阴谋文学”。这些小说为野心家、阴谋家的反动路线鸣锣开道，充当了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象发表在《朝霞》（丛刊）上的《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的《严峻的日子》，以及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些小说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唾弃和抵制。当然也有不少正直的作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排除种种干扰，坚持创作出一批较好的作品，如长篇小说有反映农村生活的克非的《春潮急》，反映解放初期矿山生活的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杨佩瑾的《剑》等。短篇小说有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孙健忠的《山鹰展翅》等，也是死水潭中难得溅起的几朵浪花。中篇小说值得提到的是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这部作品真实描写了革命根据地儿童和人民群众坚持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在当时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十年动乱的严重摧残，一度中断了当代小说的正常发展，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令人鼓舞的是，不少坚持斗争的作家在狱中、在“牛

棚”里，面对残酷的迫害，仍然秘密地构思、写作。有些好作品不能公开出版，就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表达了人民对万马齐喑的创作局面的不满和对发展文学事业的渴求。

当正义和真理的铁扫帚将林彪、“四人帮”一伙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随着国家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当代小说同整个文学事业一起，也生机勃勃地跨入了复苏、繁荣、振兴的新阶段。“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过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而在那样的时候，情感在胸怀堆积酝酿，凡是具有喉舌的人都感到说话的需要，吐之而后快”。（狄德罗：《戏剧艺术》）新时期之初，文学创作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古今中外都不多见的迅猛发展、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在这春意盎然的百花园中，小说这丛鲜花显得格外光彩夺目，香气袭人。

“四人帮”刚被粉碎，小说创作尚处于犹豫徘徊的过渡状态，还没有完全摆脱帮派文艺的理论上的束缚。虽有少数好作品问世，但总体的创作面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小说创作处于高昂的写作热情与低质的文学成果的矛盾情态之中。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反响，标志着小说创作即将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直接推动了对“四人帮”文艺路线的全面突破，拨乱反正，并进行了新的开拓。十多年来，新时期小说大致经历了从“写伤痕”到“写新人”，从“反思历史风云”到“展示改革风貌”，从“重

点题材的集中透视”到“纷繁内容的广角摄取”，从“激进姿态与轰动效应”到“一度沉寂与疏离读者”的发展历程。

短篇小说在文学复兴的潮流中，一马当先，奔腾向前。传诵不衰的佳作大量涌现，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称誉，一时形成了全国性的“短篇小说热”。茅盾生前曾给予高度评价：“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有口皆碑。建国三十年来，曾未有此盛事。”那几年，短篇创作总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现实的每一步进程，及时地吐露出人民的心声。首先出现的是一大批揭露、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深刻表现十年动乱在人们精神上造成严重创伤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宗璞的《弦上的梦》，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等，习惯上人们称之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十年动乱后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会产生文学现象。它是广大作家和作者，以战斗的激情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融汇着血和泪的题材内容，悲怆、低沉的创作基调，唤起的是人民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是对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民族灾难的深切思考。历史上几乎没有一种文学能象伤痕文学那样，在极短暂的时间内以如此巨大的精神能量，启迪着这么大国家的民族灵魂。应该看到，这个时期的伤痕小说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许多作品还停留在对政治生活现象的表层揭露，还没有能够从更宏观、更深邃的角度对十年动乱作出独特的艺术审视和精辟的渊源考察。随着文学反映生活的逐步深入，作家们以勇敢的探索精神把笔锋向历史的纵深掘进。他们用自已的小说和人民群众一起探求这场空前浩劫的成因，对十

七年时期“左”的东西加以形象化的再认识。短篇小说在这方面又充当了先锋。茹志鹃、高晓声、陆文夫、张弦等作家表现出这方面的创作实绩。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反思小说”。这些作品往往是通过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普通劳动者坎坷的人生道路，揭示了“左”的思潮给人们生活上和精神上带来的严重危害，揭示了“左”的思潮的愈演愈烈的历程。它们大多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浓烈的思辨色彩。从反映当代社会现实演变的深广度来说，它们无疑比伤痕文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反思文学的发端是从短篇小说起始的，而其深化，则更多地体现在后来居上的中篇小说之中。给这类主题带来霹雳之声的是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后来构成了贯彻新时期小说整个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的思潮。从近距离的反思发展到中距离、远距离的反思；从政治性的反思推进到社会的、道德的、文化心理、传统意识的反思；从外在生活的反思升华到心灵世界的反思。总之，反思小说可以称之为是“锋利的解剖刀”。它们剥离掉由“左”的细胞聚集成的、潜藏于祖国母体和人们思想中的“肿瘤”。当然，这其中有淋漓的鲜血，有痛苦的呻吟，有术后的挣扎……然而，更有获取新的生命力的振奋和欣悦。总体说来，这几年的小说创作采取了切近时代、正视矛盾、直面人生的激进姿态。文学站在社会斗争的前沿，积极地反映生活、干预生活。文学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发生强烈共鸣，关注点和兴奋点取得协调一致。由此而产生了古今中外都不多见的现象：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在社会生活中、在广大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的确，在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面前，作